

明清

史

研究

丛

书



清初三礼学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林存阳 / 著

本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

《明清史研究丛书》编委会

主 编： 陈 祖 武

副主编： 高 翔 杨 珍 万 明

编 委： 万 明 王 天 有 朱 诚 如

李 治 亭 陈 祖 武 张 杰 夫

汪 学 群 杨 珍 高 翔

栾 成 显 黄 燕 生

《明清史研究丛书》序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明清史研究，是在著名史学家杨向奎、王毓铨二位先生的率领之下，由众多老一辈学者奠定基础的。45年来，他们甘贫甘淡，孜孜耕耘，这块园地已是枝叶扶疏，满园姹紫嫣红。从《乾隆朝刑科题本》、《曲阜孔府档案》的整理开始，《中国史稿》明清史分册、《清代全史》、《清代人物传稿》、《明史研究论丛》、《清史论丛》、《清史资料》等，一大批学术专著和辑刊相继问世，从而显示出令人瞩目的群体优势。如今，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，也由于现行管理体制上的原因，老一辈的学者业已陆续退出研究工作第一线。然而，十分令人欣喜的是，一批优秀中青年学者正成长起来。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，学风严谨，锐意进取，已成为繁荣和发展本所明清史研究的中坚力量。

今年春天，本所明清史研究室的几位年轻学术带头人倡议，编纂出版《明清史研究丛书》。此一想法一经提出，即得到本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谢寿光同志的支持。经过近半年的精心筹划，精心组稿，适逢高翔博士、宋军博士和万明教授的三部研究成果竣稿，于是丛书的出版便提上日程。据知，继高、宋、万三位同仁的大著之后，明清史研究室诸位同仁都将陆续在丛书中推出新作。

明清史料浩若烟海，明清史研究亦有甚多可以深入开拓的领域和课题，在繁荣历史科学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，明清史研究者大有可为。我们希望在本书中，他日能不断刊出四方学者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。借此机会，我们谨向海内外明清史学界的诸位先进呼吁，恳请各位对本书的编纂出版，予以指导、支持和帮助。如蒙颁赐力作，编委会全体同仁当感激不尽。

祖武不学，无非较之诸位俊彦马齿虚长，即承他们不弃，忝任丛书主编，得以一附骥尾。其实徒具虚名，大量的工作皆是编委会诸位同仁做的。祖武惟愿竭尽绵薄，同诸位同仁一道，把这部丛书编好。

陈祖武 谨识

1999年9月23日

历史所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

作为儒家经学重要组成部分，“三礼”之学在中国传统学术，尤其在清代学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以往学术界对清代“三礼”之学研究，仅限于个别人物及某一方面，而未能做全面系统的梳理。林存阳博士撰成的《清初三礼学》一书，侧重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结合出发，通过对复兴三礼学的酝酿与发展、经学诸大师的三礼学、儒臣对三礼学的倡导与撰著、清廷决策与三礼学等问题的分析阐述，系统地揭示了清代“三礼”之学产生的思想渊源、本质特征、学术贡献，以及发展与流变的轨迹，并在此基础上为其定位。该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该领域的著作，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，对推动“三礼”之学的研究，不无裨益。

此成果不存在著作权争议。

2001年10月

《清初三礼学》审读意见

以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“三礼”之学，是儒家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，对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。但是，唐宋以降，“三礼”之学式微，元、明积衰，几成绝学。明清之际，学者激于时变，从儒家经典中寻求出路，于是多有研究和提倡“三礼”之学者，一时礼学大盛。从宋明理学转向“三礼”之学，是明清之际学术界的重大事件。研究这一转变过程的深层原因，是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。林存阳同志的论著《清初三礼学》，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这一课题的专著，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。该书主要有以下优点。

一、作者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角度，对清初“三礼”之学的发展脉络、思想特征、历史地位等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，这是前人没有系统做过的工作，作者的成绩是明显的。

二、清初礼学复盛，名家大作层出叠见，要在这方面做系统的研究，阅读的任务相当之艰巨。作者对论题所涉及的资料做了比较全面的收集和归类，对古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吸纳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。

三、作者对清初礼学诸家的学术贡献做了比较系统

的分析，对诸家的礼学思想、学术观点、论辩焦点等等都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。由于“三礼”之学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，作者的工作有相当的难度，但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绩。

四、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，与汉文化发生激烈冲突，一度采用高压政策打击汉文化。其后清廷调整文化政策，设“三礼馆”，延揽学者研究代表汉文化核心的礼学，其内在原因究竟何在？这也是清初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，作者从礼学家与统治层的互动关系着眼，做了有益的探索，提出了新的见解。

总之，这是一部很好的专著，对于推动清代学术史研究有很大的贡献，全书结构严谨，文字流畅，自成体系，已经达到了出版水平，本人同意推荐。

根据《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》评定为60分。

评定课题成果等级为A等。

审读人：彭 林

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）

2001年9月29日

《清初三礼学》审读意见

自晚清民国以来，学术界对三礼学的研究不绝如缕。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对三礼学的关注不断升温，大有成为显学之势。但比较有系统地研究清初三礼学的著作，至今尚未见到。《清初三礼学》一书则全面系统地对清初三礼学进行爬梳，可谓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，因此堪称开拓之作。本书概括起来有如下特色。

第一，作者通过对清初三礼学，如复兴三礼学的酝酿与发展、经学诸大师的三礼学、儒臣对三礼学的倡导与撰著、清廷决策与三礼学等方方面面的研究，揭橥了清初三礼学产生的思想渊源、本质特征，以及发展与流变的轨迹。并在此基础上为清初三礼学进行合理定位，给予全面评价，一幅完整的清初三礼学的画卷展现在面前。

第二，作者不局限于从学术角度追述清初三礼学的思想源流，而且还把它置于明清之际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。把学术渊源与时代因缘结合起来，探讨了三礼学与清初社会，尤其是与当时政治走向的联系。强调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，准确把握清初三礼学的时代特色，以及特有的政治伦理内涵与底蕴。

第三，本书资料翔实，立论有据。作者非空泛的议论，而是有比较坚实的历史文献学基础。学风朴实，从

第一手资料出发，以其为立论的根据，用可信的资料说话。又旁征博引，论证逻辑严谨，所得出的结论可靠。

有鉴于此，本课题成果应评为A级，建议出版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
副研究员 汪学群

2001年9月

导 言

有清一代经学的复兴，以礼学的兴起发其先声。清初诸大儒惩于晚明王学的流弊，倡为“以经学济理学之穷”之说，且在此学术潮流的蕴育下，致力于复兴礼学的努力。孙奇逢、陆世仪、顾炎武、张尔岐、黄宗羲等大儒发其端绪，遂揭开一代礼学复兴的序幕。而作为后进文化代表的满洲贵族，当其入主中原之初，便遭遇到难以克服的历史矛盾。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对满汉文化的尖锐对立重新加以审视。在艰难的抉择中，清统治者逐渐意识到，高压统治固然可取得一时成效，却非久系人心之策，无视文化传统，只能导致社会的动荡。有鉴于此，清廷为使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得到普遍认同，不仅对先进的汉文化趋于认同，而且对政治、文化政策等加以调整。官方意识形态的取向，不期然与知识界倡礼之风相契合，从而为礼学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学术空间。以此为契机，研礼者踵继而起，续有兴作。礼学家倡为以礼经世的思想，自然对社会、学术走向甚有影响；而尤可注意者，清廷对礼制的制作和儒臣对礼学的关注与探究，亦对社会由乱而治和礼学的复兴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《大清通礼》、《三礼义疏》的次第成书，徐乾学、李光地、方苞诸人礼学专著的结撰，便是其响应的积极成果。经此酝酿，三礼学愈研愈精，其成就亦越来越著。

乾嘉以降，蔚为大观。而凌廷堪、阮元继顾炎武“经学即理学”思想之后所倡导的“以礼代理”说的揭出，更将此前礼学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。一时间，说礼、研礼之风，成为潮流。此后，再经胡培翬、曾国藩、陈澧和黄式三、以周父子的推阐发明，礼学愈益发皇；而陈澧、黄以周继顾炎武、凌廷堪、阮元之后，对“礼学即理学”思想的相继张扬，遂使一代礼学思想演进得一成功总结。而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的成书，不仅比隆胡培翬《仪礼正义》、黄以周《礼书通故》、孙希旦《礼记集解》、朱彬《礼记训纂》，且使三礼学有一完整的总结。至此，三礼学完成了其在传统社会的演进历程。

当然，清初三礼学的复兴，并非仅局限于学术史意义。更有进者，它还对当时社会由乱而治，满汉文化由冲突到合流，以及整个社会思潮的转变，皆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。其所承载的政治文化功能，与所发挥的学术史意义，相互激荡，彼此融贯，为社会和学术的前进，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何以能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，依然沿着自己独特发展道路前进的文化根基所在。

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，其兴衰演进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。260余年间的学术，总结既往，承前启后，亦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。对有清一代学术的研究已成一门专学，前辈大师卓有建树，为后学开启了广阔的治学路径。本书即在尽可能吸收前贤成果的基础上，通过对清初三礼学发生发展演进轨迹的考辨，希望对一代学术的主流及其内在逻辑进行一次尝试性的梳理。

本书之撰作，主要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虑。

其一，从学术史角度而言，明清之际，理学式微，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变迁中，它已无法满足士林和社会的需要，难以有效承担维系统治秩序的功能。明清更迭，“天崩地解”的社会现实对旧有的思想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，宋明理学尤其是晚明王学的空疏学风，首当其冲成为士林批判攻诘的对象。依照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，“以经学济理学之穷”的为学致思路向应时而起，学者们遂将研究重心重又转向经学原典。在此为学路向引导之下，经学家舍理言礼，“以礼代理”的思想渐趋萌芽。经此酝酿，至清中叶以后而形成潮流，遂有“以礼代理”说的风行于世。其后，陈澧、黄以周再加推阐，故而有“礼学即理学”思想的成熟定型。因此，深入考察清初三礼学发展的情形，实有助于厘清有清一代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及趋势。

其二，从社会史的角度而言，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之后，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，在于如何有效地弥合后进文化形态与先进文化形态之间的差距，以期迅速稳定社会局势和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。但是，由于满汉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传统的显著差异，酿成彼此间的隔阂与矛盾，对清朝统治格局无疑构成很大威胁。高压统治固然可以取得一时成效，却非久系人心之策。清初的统治者在遭受挫折之后，逐渐意识到有必要调整文化政策，对先进的汉文化趋于认同。以开“博学鸿儒”及“经学特科”为标志，统治者通过崇儒重道，确立起维系封建统治的思想准则。礼学研究作为一个主要方面，理所当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扶植。官方意识形态的取向，不期然与知识界倡礼之风相契合，为礼学研究提供了客观的学术空间。司马迁尝言：“夫礼禁未然

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后。” 礼与法两位一体，相辅相成，于稳定社会和维系人心，具有决定性作用，自古便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运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。清初社会的由乱而治，直至孕育出康乾盛世，与三礼学的复兴亦有着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。

其三，从学术自身特征而言，有清一代学术，以经学为中坚。而清代经学的复兴，既以三礼学为先导，又尤以三礼学成就最著。其标志便是晚清3部礼学巨著的问世，即胡培翬的《仪礼正义》、黄以周的《礼书通故》和孙诒让的《周礼正义》。然而，这一成就的取得，实导源于清初诸儒的努力。或者说，清代三礼学的发皇，是承继清初三礼学的成就而加以发扬光大的。为山复篲，后海先河，清初诸儒的创辟之功，实不可没。

再就三礼学的研究状况来说，治是学者，自晚清经学大师皮锡瑞著为《经学通论》，对三礼学多有精辟论辩以来，前哲时彦，相继发明，成果甚多。有通论三礼，梳其源流者，如刘师培之《经学教科书》、钱基博之《经学通志》、甘云鹏之《经学源流考》、周予同之《群经概论》、范文澜之《群经概论》、王静芝之《经学通论》、蔡尚思之《中国礼教思想史》、钱玄之《三礼通论》、胡戟之《中华文化通志·礼仪志》等；有断代为限，考其沿革者，如杨向奎之《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》、杨华之《先秦礼乐文化》、陈戍国之《先秦礼制研究》、苏志宏之《秦汉礼乐教化论》、华友根之《西汉礼学新论》、陈戍国之《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》、小岛毅（日本）之《明代礼学的特点》（文章）、张寿安之《以礼代理——凌廷堪与清

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》等；有结为专集，重点探研者，如高明之《礼学新论》、李云光之《礼学论集》、李曰刚等之《三礼论文集》、陈其泰等之《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》等；更有详加点勘，发明前贤者，如王文锦、陈玉霞点校之《周礼正义》，段熙仲点校之《仪礼正义》，沈啸寰、王星贤点校之《礼记集解》，饶钦农点校之《礼记训纂》等。此外，还有撰为专文，探讨某一礼学专题者，其数量相当可观。以上诸作，各抒己见，交相辉映，于三礼学皆有或通或专的研究。然相比较而言，对三礼学在清初的发展演进状况，尤其是从学术思想史角度加以探究的，则着笔不多，尚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。故而，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视角，对清初三礼学的发展脉络、思想特征、历史地位等做一系统梳理考辨，实有必要。

本书大体以清顺治初年至乾隆初年为主要考察时段（依学术界通行界定，清初指顺、康80年间这一历史时段，或下延包括雍正朝。本书之所以将这一历史时段再延至乾隆初年，乃从清代三礼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特征角度考虑。因为就有清一代三礼学演进历程来看，以乾隆朝修《三礼义疏》、《大清通礼》，及秦蕙田著《五礼通考》为界，这之前三礼学发展的特征表现为学术取向和研究领域之“大”，为此后三礼学研究奠定了基调。而在这之后，三礼学研究转向专精，且体现为考证训诂之成熟、完善、系统，当然亦具有思想之思考。此乃乾嘉时期三礼学之研究学术特征），旨在本质地重现清初三礼学复兴的轨迹。同时，亦兼及清中叶和晚清三礼学梗概的梳理，以彰显清初复兴三礼学的历史影响。

本书拟采用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，通过对

礼学家及其与清廷文化政策互动关系的探讨，董理清初三礼学在满汉文化由冲突到合流的演进过程中，之所以能够复兴，以至渐成规模的内在原因、思想特征与学术成果，总结其在清初社会由乱而治过程中所承载的政治文化功能，以及在知识界为学路向由理学向经学转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。此一问题的探讨，意在揭示清初三礼学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功能，以及考察礼学思想在当时社会中所发挥的学术史意义，而且观照其对当代精神文明的塑造所具有的史鉴意义。众所周知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学术思想的演进并非孤立的，它与时代潮流和文化趋向联系至为密切。最高统治者的意向及文化统治政策的调整，对学术思想演进具有引导作用；反过来，学术思想的演进亦会影响统治者的好尚和文化政策的调整。此一动态关系，是我们探讨清初三礼学的立脚点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我们应对礼、礼学、三礼学略做辨析。就其关系而言，这三个概念既相关联，又有一定的区别。从渊源及研究对象上来说，三者是相继发展的三个阶段，且都以礼作为研究对象，这是其关联之处。但它们又有所区别：礼的产生最早，其内涵亦最广。在先秦时期，它几乎包罗万象，大凡政治、经济、思想、社会生活等，无不在其视野之内。礼学，是对礼加以认识和研究理论思想学说和体系，直到春秋战国之际的孔子之时，方得以形成。孟子、荀子继孔子之后，对礼学的研究趋向深入，更具理论性、系统性，并为此后的礼学研究定下了基调。而三礼学是对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诸文献思想进行探讨和阐发的一门学问。郑玄之前，已有人着眼于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的研究，但直到郑玄为之分别做注，始有“三礼”之目。从这个

意义上来说，郑玄是三礼学的开创者。此后，三礼学虽时有盛衰，却不乏生命力，对之加以董理注目者，代不乏人。至清初，随着时局和学术风气的转向，三礼学遂再度复兴起来，并取得了足以超迈前代的成就。此后，研究者踵其风而起，对三礼学的研究愈益成熟，在思想方面的阐扬亦达到一新的高度，至清中叶后达到鼎盛。这一学术取向，其影响直到晚清仍余韵犹存。

另外，从礼的内涵方面来讲，其有礼义、礼仪、礼俗等层面之分。礼义是对礼本身所蕴含的意义的阐发和张扬，它包括礼时为大、以礼为治、礼顺人情等内涵。此层意义是历代礼学家所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，以及所赖以经世的理想范式；同时，亦是统治者据以为治的思想依据，尽管他们不一定就以此施行。礼仪是据礼之精神所制定的仪式规范，它更具有现实规范性，且在专制王权统治下被赋予等级性。礼俗是下层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行为规范，它以礼为依据，但亦有所异变、超越。这三个层面彼此渗透，相互作用，共同构成一有机整体。然而，我们也应看到，在专制王权社会里，上层统治者及精英人物对礼学的倡导与扶持，虽然从统治层面来讲有整合社会、规范人们行为的积极作用，但是，统治者对礼学的权力规范，在一定程度上却抹杀了礼的活力。从礼的等级名分方面来说，它对臣民具有一定的束缚，从而形成一种思想禁锢。统治者在具体政治运作中，往往不能按预设的理想模式行事，其理想型与现实操作之间有很大的差距，“礼不下庶人”传统思想难以突破。而就其与礼俗层面的关系来说，统治者的取向无疑对下层人们具有引导、规范作用，他们对礼学的扶持和倡导，对下层人们的思想行为亦具有很大影响。但我们